

中国的日本人社会
Japanese Communities in China
—Interviews with Migrants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青山 玲二郎

北京大学外語学院日語系在読 2009 級博士研究生

要旨

1990 年代以降、中国に移住する日本人は急激に増加している。日本の外務省（2010）によると、中国には 12 万 7282 人の日本人が滞在しており、アメリカ合衆国に次いで日本人移住者が多い国となっている。経済的に豊かな日本からなぜ中国へ人々が移動するのか。この問いに答えるため、本研究では移民理論で使われている Push-Pull Factors（押し出し引き入れ要因）を援用し、日本人移住者が日本から押し出される理由を雇用機会の減少と捉え、中国に引き入れられる理由を中国の入国管理政策にあると指摘した。

現代日本人移住者に対する研究は中国ではほとんど行われていないが、北米やオセアニアでは幾つかの成果があり、多くの研究が駐在者コミュニティと永住者コミュニティの二分法を利用して、これを踏まえて調査項目を設定し、上海と香港の日本人移住者にインタビューを実施したところ、企業から派遣された駐在員と現地で採用された人々では、ジェンダー、言語、日本企業、現地人に対する考え方が対照的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

キーワード:

日本企業、上海、香港、駐在員、現地採用

中国的日本人社会

青山 玲二郎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在读 2009 级博士研究生

1. 序言

1990 年后移居中国的日本人数目激增。据日本外务省（2010）统计，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数目已经达到 12 万 7282 人，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移居第二大国¹。本论文将站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日本移居中国的动机，从而找出日本人从经济发达的日本移居至中国的原因²。

在有关日本移居中国的研究中，关于 1945 年以前的上海租界、旧满洲地区的调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很丰富。但有关现代日本移居者的调查还很少。本研究采用移民研究的著名理论 Push-Pull Factors（推拉理论），在“推”的方面主要关注日本就业机会减少这一因素，“拉”的方面主要关注中国的入境管理政策。

参考在澳大利亚和北美所进行的现代日本移居者的调查研究，考察日本人为何离开日本去到北美和澳洲，设计了中国日本移居者的调查项目。

最后，基于对上海和香港日本移居者的访问，考察日本移居中国的动机，以及在中国形成了怎样的日本人社區。

2. 移民研究的理论

关于“人为何要移居”这个问题，自十九世纪大量人口移居至欧洲、美国、澳洲开始，经济学等社会学科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用“薪酬差别”说明它的原因。认为在劳动力富足但资本不足的地区薪酬较低，而在劳动力不足资本富足的地区薪酬较高。因此，劳动力从薪酬高的地区移向薪酬低的地区³。Lee 从这一理论中发展出了“推拉理论”（Push-Pull Factors）。

（Lee 1966）关于移居者从某一地区被推出的原因，他举出人口增加、就业机会低下、生活水平低下、人种差别、战争、大气污染等因素；而关于移居者被拉进另外一个地区的原因，则包括就业机会增大、生活水平提高、自由、气候良好等因素。这一理论成为移民研究的代表性理论，也适用于日本移居中国的情况。例如，日本人离开日本的理由是就业机会减少，进入中国的理由是生活水平提高等等。但是仅从经济角度说明这个问题似乎有失偏颇，由于许多日本人即使薪酬降低也愿意移居中

¹ 在中国生活的海外人口数量 2002 年至 2003 年度超过巴西位居全世界第二。
（日本外务省 2003）

² 日本经济不景气的说法虽然由来已久，但人均 GDP 仍然位居世界第 16 位，处于亚洲最高水平。
参照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1 年 9 月版)。

³ 新古典经济学在 Thorstein Veblen 1900 年的著作 Preconceptions of Economic Science 中被首次引入。

国，因此这个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日本人移居中国的现象。移民研究中第二大影响力的理论是“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Dual Labor Market Theory）。这一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高技术劳动力市场（第一市场）和简单劳动力市场（第二市场）。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愿再从事简单劳动，因此简单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匮乏，薪酬提高，从而吸引外来劳动力进入该市场。由于日本人在中国大多数从事的是高技术劳动，从事简单劳动的人数十分低，因此这个理论也不适用于日本人移居者的情况。还有一种移民理论认为移居并非个人决定，而是由家庭决定。认为家庭中某一成员为了弥补家庭收入的不足，只身赴海外工作，借以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另外，还有一种从移居多发地区多为贫富差距悬殊地区这一事实发展出的“相对缺乏理论”。即贫穷家庭通过与周边富裕家庭的比较而考虑将移居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手段。移居者从移居地向出身地汇款，让小孩子接受教育，购屋置业，他们因此而在当地成为成功者。周边的家庭以成功者为对象进行模仿，产生移居的意愿。这一理论以家庭为单位考量移居的原因，也不适用于日本人个人移居的情况⁴。一般而言，上述理论适用于从发展中国家移居至发达国家的情况，很难用以说明日本人移居中国的动机。因此，以下采用最具代表性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推拉理论”（Push-Pull Factors）来进行深入考察。

3. 日本“推”出日本人的原因

日本人被推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经济全球化和日本就业机会的减少。“日本生产、卖向世界”的商业模式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带来大额的贸易顺差。但是，由于日本人力成本提高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从经济角度看，继续在日本生产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因此，日本企业在1980年以后迅速拓展全球化市场，在纽约、伦敦、杜塞尔多夫、上海等地设立分公司，开展生产⁵。日本企业将员工派往这些分公司，负责生产统筹和与日本接洽的工作。这是1980年后日本来华派驻人员激增的原因。另外，随着世界市场的复杂化，负责市场分析的营销人员、担当法律咨询的律师、负责会计业务的会计师等，也开始由总公司向海外输送。这些海外派驻人员已经习惯了3-5年期间将家人留在日本单身赴任的生活。但是，近年来海外驻在5年以上的人员数量有增加的倾向，为了让孩子接受海外教育而携妻儿一同前往赴任的情况也越来越多⁶。

另一个趋势是日本国内失业率的增加。据总务省统计，日本2010年完全失业率达5.1%，失业人口达到334万人，较1995年的3.2%、210万人有较大幅度的攀升。（总务省2011）不仅日本国内的整体失业率增高，15岁到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达9.6%。这一状况被称作“就业的冰河期”，自泡沫破碎后的1993年一直持续到2005年。景气恢复、冰河解冻以后，企业开始重新雇佣失业者，但是由于日本有“应届毕业生一次录用”制度，往届生几乎无法被录用。所谓应届毕业生一次录用，是

⁴ 调查对象中向日本汇款的占5%。汇款人有来中国单身赴任的派驻人员和退休后来中国的高龄者。

⁵ 详细内容参照 Saskia Sassen 的 *Global Cities*，文章中介绍了全球化进程中伦敦、东京等国际都市的特殊地位。

⁶ 上海自2000年以后开始加速完善国际学校和日本人学校的设备、制度。

指高中或大学为即将毕业的学生统一提供终身雇佣担保、使其成为公司的正式职员之制度，往届毕业生不享受作为正式职员应征的机会。因此，往届生作为正式职员就业的途径减少，往往成为没有福利待遇的派遣员工或合同制员工。派遣员工和合同制员工的雇佣期限是固定的，雇佣期满后必须再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因此而再度进入失业状态。这也成为许多年轻人回到学校再深造和赴海外留学的契机⁷。

4. 中国“拉”进日本人的原因

中国吸引日本人进入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快速成长和伴随就业机会增大而变化的出入境管理政策。据日本外务省日本人海外居住人口数量统计（2010），至2009年10月1日海外居住的日本人数量达113万1807人，其中有12万7282人生活在中国。在华日本人数量自2002年至2010年间从6万人增至12万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上海（4万8255人）、香港（2万1210人）、北京（1万416人）、广州（6080人）、大连（5427人）、苏州（5129人）、深圳（3941人）等大城市⁸。随着中国沿海大城市的经济发展，外国人就业机会增加，大批日本人移居进入该地区。

同时，联合国人口开发报告（2009）综合分析移民现状后指出，人口迁移与各国的出入境管理政策关系密切。一般来讲，伴随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的多样化、费用的大众化，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自由地在世界各地迁徙。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国家成立后，国境不断增多，签证制度化加强，人口迁移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大。尤其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在签证申请上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国民的巨大负担。因此，国际间的人口迁移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出入境管理政策的左右。

同样的，与联合国研究报告相反方向的一一从发达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日本人向中国的迁移，也受到中国出入境管理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广东省多个城市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包括上海在内的多个沿海城市。由此，日系企业开始进入沿海各城市，日企员工开始进驻以上地区。1992年起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日系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驻华人数有所波动，但日本驻华人数常年来逐年增长。

上述对外开放政策与入境管理政策是一以贯之的。现在，日本人在华停留15日以内免签证，15日以上需要旅游签证（L签证），但只要在旅行社提供机票和酒店等逗留地址马上即可取得。

长期逗留根据目的不同申请不同的签证。以留学为目的的申请留学签证（X签证），以工作为目的的申请工作签证（Z签证），此外还需取得外国人居住证明。申请留学签证只需提供个人健康证明、接收学校的证明文件和居住地点证明。工作签证在外国人居住证明的基础上，还需要外国人就职证明，包括简历、资格证明、就职单位开设的雇佣证明、雇佣协议书等等，尽管资料繁多，但与美国、

⁷ 在上海的调查对象多数有作为合同制员工或派遣员工工作的经验。

⁸ 海外居住人数统计（2010）指出，日本国内人口减少，海外居住人数攀升。

欧洲等国相比，资料审查并不算严格，多数情况可以顺利取得签证。长期逗留留有 1 年至 5 年不同种类的逗留许可，在逗留期满后都可以办理延期手续。

另一方面，外国人在中国取得永久居住权很难。条件是在中国有 50 万美金以上的投资，在政府、国企或大学享有较高地位、与中国人结婚满 5 年等等。由于永久居住权很难取得，而长期逗留的手续相对简单，因此，在中国居住的 12 万 5928 日本人中有 12 万 4480 人都属于长期逗留者，而永久居住者非常少。

5. 关于日本人移民的先行研究

如上所述，日本经济全球化和失业率增加、中国经济发展和出入境管理政策的变化，成为日本人移居中国的原因。为了进一步考察日本人的移居原因，有必要参考有关日本移民的先行研究。1945 年以前旧满洲地区的移民调查和上海租界历史的研究，在质、量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⁹。博斯坦宣言之后，居住在中国战区的日本居民、俘虏，合计 213 万 8353 人在中国政府和美军的协助下几乎全数被遣送回日本（陈 2006）¹⁰。因此，1945 年以前的日本移民和近年的日本人移居者没有直接联系，性质也很不相同。现在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大部分是 1990 年以后的移居者，以他们为对象的研究至今还很少。

在近年日本移民的研究中，Harumi Befu 的研究是最具概括性的。（Befu 2001）

他的研究把日本人社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日本企业派驻人员及其家人形成的社区。在这个社区中，由于派驻人员逗留几年后会返回日本，因此社区成员每几年就会全部更新一次。但是由于又会有新的派驻人员被输送进来，社区得以永续存在。第二类是永住者社区。包括因与外国人结婚而移居的日本人、想要离开规章制度繁多的日本在海外寻找商机的日本人、派驻人员子女在当地就学后留在当地生活等等。第三类是旅行者社区。尽管旅行者在当地停留数周后返回本国，社区的成员时常更新，但社区得以永续存在，支撑着以日本游客为对象的酒店、礼品店和旅行社的经营。夏威夷的怀基基海滩（waikiki beach）社区就属于这种类型。第四类是旧移民团体。是指由二战以前或 1950 年、1960 年的移民形成的社区，最有代表性的是日系美国人、日系巴西人。

除上述概括性研究以外，在对某一特定地区的详细研究中，佐藤真知子将移居澳大利亚的日本人命名为“精神移民”¹¹（佐藤 1993），可谓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驱。1980 年以后移居澳大利亚的日本人从年老者到年轻人，从上流阶层到中产阶级、普通劳动者，从整家迁移到单身迁移者，十分多样。

佐藤将澳大利亚移居者分为三个群体。一是退休后为寻求良好的居住环境赴澳的中、老年人；二是为脱离男女不平等的日本社会而赴澳的女性群体；三是日本料理师傅、按摩技师、美容师等职业人

⁹ 1990 年成立的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对在上海的日本人租界和日本人社区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¹⁰ 统计数据来自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1945）《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

¹¹ 佐藤真知子在《新·海外定居时代—澳大利亚的日本人》中提出“精神移民”这一说法，英文版《Farewell to Nippon》中译为“Lifestyle Migrants”。

士群体。1970 年以前的日本人移居者大多是出身较贫困的农村人口或城市人口，他们大都为了经济目的而移民澳大利亚，被称作“经济移民”。与此相对，佐藤划分的三个群体都是在 1980 年日本经济发达以后去到澳大利亚，主要是为了追求“生活品质提高”的“精神移民”，他们的移民动机不能完全用经济原因来解释。“经济移民”与“精神移民”的最大差异是，“经济移民”大多数是以放弃日本、在澳大利亚度过余生为前提的，而“精神移民”并未决定在澳大利亚度过一生，他们与日本还保持着持续的联系。

佐藤的研究是以凭个人意志而离开日本的人为对象的，而 Junko Sakai 的研究是以被公司派遣的派驻人员为对象的¹²。（Junko Sakai 2000）根据他的研究，外派伦敦的公司管理层日本人，在谈起工作、生活时特别强调日本文化的身份认同。对于他们来说，日本文化身份与英国文化身份是完全不同的。在伦敦的生活威胁到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感，使得他们反而更强烈意识到日本文化身份。他们强调自己毕业于良好的大学、从事权威性的工作，以工作时间长、对公司忠诚度高和能够听取下级意见为傲¹³。而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女性职员和职位较低的职员，并未意识到日本文化身份与英国文化身份的差别，徘徊在两种价值观之间。他们的价值观显现出不稳定性，却有超出日本文化/英国文化两项对立，试图创造出第三种文化的倾向。

近期的藤田结子的研究以伦敦和纽约的日本艺人为对象。（藤田 2008）在伦敦和纽约，生活着很多学习戏剧的年轻人、想要成为 Hip-Hop 舞者的女性、梦想成为画家的男性，他们怀着对艺术的热爱移居到这里。藤田把他们称为“文化移民”，详细研究了他们的“民族身份”是如何变化的。他们在日本生活的时候，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接触伦敦和纽约的信息，在头脑中形成作为艺术中心的“想象中的欧美”。对于生活在像日本这样与欧美同等经济条件国家的年轻人来说，“想象中的欧美”绝对不是被当作比日本更富裕的对象而憧憬的。他们向往的不是“想象中的欧美”，而是“生活在想象中欧美的自己”。对他们来说，纽约不过是个与东京相似的普通地方，但却可以提供在东京难以得到的成功的机会。然而，在纽约或伦敦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他们逐渐感到日本人作为亚洲系外国人在人种上的弱势地位。加之语言问题，他们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成为美国人或英国人，这时，强调“日本人特质”的民族身份意识开始觉醒。想当画家的人开始主张日本式的艺术美感，女性开始把“日本女性特质”作为武器。

上述以文化身份为中心的研究中还有加藤惠津子对温哥华的年轻人做的调查。（加藤 2009）加藤对利用打工度假机会到加拿大温哥华居住的年轻日本人做了访问。打工度假（Working Holiday）是一种为 18 岁到 30 岁的年轻人提供为期 1 年时间在外国边打工边度假机会的制度¹⁴。日本政府继 1981 年与澳大利亚缔约后，分别在 1985 年与新西兰、1986 年与加拿大缔结协议¹⁵。加藤把这种年轻的移居

¹² 研究指出，派驻人员一般在伦敦生活 3 年到 5 年。

¹³ 研究指出，许多派驻人员经常光顾当地的高尔夫俱乐部，送小孩子去英国学校，试图与当地的英国文化建立关系，但却难以融入英国文化。

¹⁴ 根据缔约国的不同，有些国家规定年龄为 18 至 25 岁。

¹⁵ 1999 年以后缔结协议的包括韩国、法国、德国、英国、爱尔兰、丹麦等国家和地区。

者称作“自我发现移民”。他们来到加拿大并没有明确的目的，而是为了“寻找自己想做的事情”而离开日本的。去到国外后，也出现年轻人因为生活在国外这样一个“梦境”般的环境里，而陷入男女关系纠纷、或吸食药物麻醉自己的情况。对日本的年轻人来说，工作等同于参与社会的活动，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尽量缩小自己与工作之间的界限、找到理想的工作，就意味着找到理想的自己。所以，他们通过度假打工的方式或在日本不断寻找自己理想的工作，借此来发现理想中的自己。

6. 派驻人员社区与永住者社区

在北美、欧洲和澳洲的研究成果中，经常将海外日本人社会分为派驻人员社区和永住者社区两类。在本次访问调查中，对于“来中国的原因”、“对中国的感受”、“对日本的感受”这样的问题，认为自己是“派驻人员”的人和认为自己是“当地雇佣”的人的想法形成鲜明的对照。“派驻人员”和“当地雇佣”的两项对立是在访问过程中受访问者自己经常挂在嘴边的词语。特别是，当地雇佣的人会举出诸如“我是当地雇佣，所以要自己买保险”等各种理由来说明自己的身份。这些人中有的是在中国的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当地日系企业工作的，有的是通过互联网在日本找到中国的工作的，有的是当初作为派驻人员被派往中国后又转职到其他公司的。他们与派驻人员的差别在于，什么时候回去日本并没有特定的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把他们划入未来的永住者的范畴。

因此，也可以把在中国的日本人移居者划分为逗留数年后即回国的派驻人员和回国时间未定的永住者。派驻人员及其家属在上海一般集中在虹桥区和浦东新区。虹桥区有日本领事馆，离虹桥机场较近，所以深得经常回日本出差的公司职员的喜爱。浦东新区虽是新开发的地块，但靠近新机场、设有日本人学校，所以有多栋以日本派驻人员为对象的公寓楼。在香港，日本人多集中在太古城和红磡两个区域。太古城位于香港岛，交通便利，靠近日本人学校，许多有小孩子的派驻人员居住在那里。红磡位于九龙半岛，是九广铁路的终点，直通中国大陆，是与中国大陆有生意往来的日本人的首选。因此，靠近日本人学校、上班方便、靠近机场等成为日本人选择这些地区居住的原因。另外，周边有日本餐厅、日本超市、洗衣店、咖啡厅等可以用日语沟通的生活环境也是选择的重要考量。

相对地，永住者居住的区域由派驻人员社区向周边扩散。他们的居住范围并不是某一特定的区域，而是在派驻人员社区周边形成若干小社区。那里的房租相对较便宜，商店和餐厅的价格也较接近当地的平均物价水平。此外，也有人特意选择远离日本人社区的地方生活，或是居住在曾就读的大学附近。总之，永住者社区的分布较为分散。上海和香港的地铁网络已相当发达，即使居住地距离市中心稍远，也不会给上班带来不便。

不属于上述两种社区的是旅行者。上海和香港离日本很近，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日本游客到访。游客在日本的旅行社参加 1 到 7 天不等的旅行团来到中国。上海和香港都有很多业务是靠大量游客来支撑的，例如酒店、土产店、旅行社、面向游客的餐厅等等。这些业务一般由当地人经营，从业人员大都会讲日文。因此，与夏威夷同样，日本移民碰见日本游客的几率很小。

此外，二战以前来华的日本人旧移民现在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了。二战后，大部分日本移民被遣送回日本，1950年和1960年移居中国的日本人数量极少，旧日本移民已经很难形成一个社区了。

7. 调查地点与调查方法

调查地点选定为日本移居者最多的上海（4万8179人）和第二的香港（2万1210人）。为了说明在沪日本人的生活环境，首先介绍上海的情况。

据上海市的统计（2008），上海常住人口1888万4600人，流动人口500万~700万人，合计2500万人左右。劳动力年均收入3万9502元（约50万日元）。另据日本外务省统计，在沪日本人数量不足5万人，在数字上完全属于少数派。但是上海城市中心有日系百货商店，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中国人、学习日语的中国人都很多，从文化角度讲，在沪日本人并不会觉得日本文化的存在感很小。根据上海市外国人统计（2005），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总数中33.3%是日本人，由此可以知道在上海外国人社区中日本人的存在感。外务省所说的5万人，是根据将在留回执提交领事馆的人数计算得来的，加上留学生、当地雇佣等没有提交在留回执的人员，数量可能达到10万人。

中国各地区之间在日本人移居模式和社区形成上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在上海、苏州、大连和北京，日本人数量激增的情况发生在1990年代以后。而在香港则为1970年代末，到1987年就已达到1万人。广州、深圳等地也由于1980年代后半改革开放的影响，较上海等北方城市更早地有大批日本人开始移居。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统计（2011），香港人口710万8100人。在国籍方面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根据2006年的人种调查，日本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白人、印度人和泰国人排名前6位。在香港的外国人社区中，日本人并不能说是具有代表性的存在，但是日本企业的数量和日本文化的影响很大，几乎所有的购物中心都有日本餐馆。

作为调查方法，在2008年12月至2011年11月开展了访问式调查。调查对象通过调查者2003年至2006年期间结识的日本友人，以滚雪球的形式介绍而来。选择其中在中国居住超过1年的人员作为分析对象。在上海和香港的不同地方对总共47人进行了面对面的访问，询问他们来中国的原因，然后用邮件、电话等方式又进行了多次联络。与每个调查对象的沟通次数不尽相同，但均为3次以上。这47人中，女性25人，男性22人。年龄分布20~30岁21人，30~40岁8人，40~50岁9人，50~60岁9人。派驻人员14人，派驻人员家属8人，当地雇佣者15人，留学生8人，个体业者2人。

8. 访问调查结果

派驻人员一般是由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直接派遣的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访问对象中有14人是派驻人员，男性13人，女性1人¹⁶。他们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单位上班，几乎所有人都有加班到9点

¹⁶ 在中国的日本人多为男性。据外务省统计（2009），北美和欧洲的日本女性较多，亚洲、南美和美国男性居多。原因可能是北美和欧洲多录用学生和当地人，而亚洲多为派驻人员。

或 10 点的经验。下班以后经常要与同事、上司或客户去餐厅或居酒屋用餐。有家属的人，周末或在家度过、或外出购物、或参加孩子的活动。其中一部分人由于频繁回日本参加会议而感到疲惫。也有人周末参加足球赛或同乡会，以缓解压力。

他们的待遇根据就职单位的不同有很大差别，最好的情况是包括日本工资、奖金、健康保险、年金，当地工资、当地住房补贴、交通补贴、保姆工资、家属补贴、子女补贴、子女学费、差旅费、接待费等等。不过现阶段企业都在削减派驻人员开支，待遇较之前有所下滑¹⁷。

受访人来华动机多为看重中国市场未来的发展前景，希望在这里积累工作经验，同时他们也承认在当地的工作经验方面，当地雇佣人员较派驻人员更有优势。其他好处包括，在中国，高尔夫、居酒屋、风俗场所等价格较日本低廉，可以尽情游玩等等。相反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当地人中国人素质较低、培训当地职员较为困难、两国商业习惯的差异、出差时交通不便等等。

关于派驻人员的亲属，大多数派驻人员为男性，他们的家属为女性¹⁸。这些女性多为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有子女的主妇以日本人学校的人际关系为生活重心，而没有子女的人则离日本人社区相对较远。主妇们平时学习中文等其他外语、茶道、料理、舞蹈等等，周末参加日本人学校的活动或日本朋友的聚餐。她们也认为中国在空气质量、食品安全、交通状况等方面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一方面日本人居住的区域相对安全，可以让小孩子自由玩耍，另一方面聘请保姆费用低廉，做家务、教育孩子的时间相应减少，自己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在兴趣爱好上，等等。因此主妇们都希望可以在中国多居住一段时间。也有主妇说，夫妻吵架后可以一个人去女性专用酒吧喝酒，在中国可以享受到在日本享受不到的自由。但是，一旦丈夫公司发出回国命令，她们都认为应该要回国。其中也有人想在中国工作，但是这里工资较低，与当地人争夺工作机会是非常困难的。

永住社区可分为当地雇佣人员和留学生两类。另外还有跟中国人结婚和经营以派驻人员为对象的餐厅等项目的业主等等。永住社区里的人也并非都完全决定了会永远生活在中国。更有些人即使决定了一直在中国居住，也对取得中国永久居住权毫无兴趣。还有人尚未确定未来的计划，只是暂时没有回国的打算而已。这些人都划归在这一群体中。

当地雇佣者可以通过日系猎头公司较容易地找到工作¹⁹。现阶段，由于薪酬待遇等问题，中国企业并不是日本人就业的好去处，因此日本人多数在日系企业、美国或欧洲企业工作。他们在中国留学，掌握汉语以后，通过熟人或中介公司等途径找工作。这些人的待遇仅为在中国当地领得的工资，公司并不负担日本工资、保险、年金等。据日系猎头公司介绍，如果是毫无工作经验的人，在中国当地的

¹⁷ 派驻人员待遇的差别与就职企业的规模成正比。大公司职员可以领到日本和中国两份工资，住房也由公司补贴。而中小企业职员没有日本工资，有些人也没有在中国的住房补贴。

¹⁸ 受访者中只有一名女性派驻人员。她的丈夫没有工作，在家照顾 3 岁的孩子，是家庭主妇。

¹⁹ 日本大的猎头公司在上海和香港都有分支机构。因此，在日本也可以找到海外工作的机会。

工资约为 7000 元人民币（约 9 万日元）起²⁰。有些公司甚至不支付当地的保险费用。日系企业在雇佣当地中国员工时，需要支付年金、失业保险、健康保险、生育劳动灾害保险等，但是雇佣在当地的日本人时，按惯例不支付以上费用。

和在日本相比，当地雇佣人员在中国可以有更多机会负责较为重要的工作，也更有机会进入公司的管理层，因此很多人认为工作较有价值感。也有些单身女性和未婚妈妈觉得，在这里自己是外国人，不必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心理上感到很轻松自在。但也有人担心自己在技术、专业知识和商务礼仪方面可能与在日本的同龄人存在差距。还有人因为自己与派驻人员年龄相仿、从事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同等的待遇而感到不满。另外，也有人因作为公司的中间管理层、夹在当地人和派驻人员之间而感到压力。

在华留学生多为来华进修汉语的学生，修学位的学生很少。学习汉语的学生中女性居多，她们多生活在大学周边，大部分是 20 岁上下的女性。也有人 30 几岁辞掉工作来到中国，或是 60 岁退休之后来到中国。

留学生全部是因为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期待而想来中国就业。然而，未来回到日本、作为派驻人员来华也好，在当地直接就业也好，对他们来说都很苦恼。在日本就业的话，可以享受良好的福利待遇，但不知是否有机会被派到中国。而且，即便被外派，也未必被派到上海、香港这样理想的城市。另一方面，如果在当地直接就业，待遇则非常差。不过，中国的生活较日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物价也较低，生活可以较为轻松。由于在中国有留学时代的日本朋友、中国人邻居，可以通过与他们的交往使生活变得很充实。留学生自己也会抱怨中国人素质低下，但是如果有日本朋友指责这一点，他们会感到很气愤；同时，他们也不满意有些日本朋友对中国毫无兴趣。

访问中发现，生活在上海和香港的受访者，由于居住的城市不同，在想法、性质和社区形成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里主要想考察日本人移居中国的整体情况，因此忽略城市间的差异，着重关注两个城市的共通之处。例如，为了了解来华动机，在问到“为什么来中国”时，上海的受访者表达了对上海的向往，也阐述了香港的特征，这种城市间的差异也被认定为移居的动机。另外，关于上海和北京日本人社区的形成，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多供职于政府部门或媒体界，而上海的日本人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中小企业工作。关于上海与香港的差异，在此不加以赘述。

9. 调查结果分析

以上把访问调查结果分派驻人员和永住者进行了描述，接下来将对二者进行比较。

派驻人员多为男性，经济条件优越，集中在城市中心区生活。他们携带的家属多为家庭主妇，很多人在当地雇佣保姆，主妇从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时间花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另一

²⁰ 据大型猎头公司介绍，日本人薪酬正在快速下滑。1990 年代只有在月薪 1 万 5000 元以上，香港平均约 2 万港币左右。但是 2000 年以后，日本人越来越多，会讲日语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日本人的薪酬正在迅速逼近中国人。

方面，当地雇佣人员较当地中国雇员薪酬高，但较派驻人员低，忍受着十分不利的福利状况，在日本人社会中处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在华日本人社会的〈派驻人员—当地雇佣人员〉图表与在日本的〈正式员工—合同制员工〉的待遇差别极为相似，可以说在华日本人社会是日本社会在中国的缩影²¹。

永住者的留学生中女性较多，她们因为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深感兴趣而来到中国。但是无论是被作为派驻人员外派中国、还是在当地被直接雇佣的可能性都小于男性，生活在日本本土企业和中国日系企业的双重不利环境中²²。男性派驻人员把日本公司不派遣女性来华工作解释为“因为危险”。他们认为虽然上海、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十分安全，但到其他城市出差、经营时，对女性来说较为危险。另外，在中国的日本人较少，很难在这里找到结婚对象，因此适婚年龄的女性一般不被外派，况且很多女性或许根本就没有意愿来中国工作。关于不在当地雇佣日本女性职员的原因，有人表示，会计、咨客、文件整理等工作比较适合当地的中国人，公司往往期待日本人能胜任营业的工作，但日本女性并不适合中国的经营环境。追究其原因，与上述安全问题相同，在中国接待客户时需要饮酒，很多情况并不适合女性。

10. 结论

日本人口正在逐渐减少，但是移居海外的日本人却不断增加。随着日本企业进军海外，日本人不仅移居北美和欧洲，也开始在拉美、亚洲（包括中国）生活。日本人之所以离开日本，主要因为国内的就业机会减少和日本企业的雇佣制度。中国之所以吸引日本人的原因，是中国的就业机会增多和中国政府的入境管理政策。移居中国的日本人可以分为仅逗留数年的派驻人员和尚未确定回国时间的永住者。他们分别生活在派驻人员社区和永住者社区。属于派驻人员社区的受访者指出，中国企业经营模式带有后进性，他们对日本企业文化的优越之处持肯定态度；而属于永住者社区的受访者对中国未来发展满怀期待，指出“日本企业人际关系复杂”、“对年轻人要求苛刻”、“难以工作育儿两全”等不利因素，对日本企业文化和在日本的生活持否定态度。二者的意见形成鲜明对照，显示了日本社会阶层的差别和日系企业的性别歧视。

²¹ 参考 Mathew and Sone (2004)。其中把正式职员与合同制员工的差别对待称为“差别社会”，这个名词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²² 参考 n-Ari, Eyal; Yong, Yin Fong Vanessa (2000)。其中描写了女性在日本和新加坡两个国家，在企业中被差别对待的状况。

参考文献

- 岩崎信彦ほか編（2003）『海外における日本人、日本のなかの外国人』昭和堂
- 外務省領事局政策課（2009）海外在留邦人調査統計
<http://www.mofa.go.jp/mofaj/toko/tokei/hojin/10/index.html>
- 上海市政府（2009）上海統計年鑑 2008
<http://sh.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4651/node24652/index.html>
- 中国陸軍総司令部編（1945）『中国戦区中国陸軍総司令部受降報告書』
- 北京市統計局（2009）北京統計年鑑 2008 <http://www.bistats.gov.cn/>
- 柳原和子（1994）『「在外」日本人』晶文堂
- 中澤高志ほか（2008）“海外就職の経験と日本人として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シンガポールで働く現地採用日本人女性を対象に”『地理学評論』81：95-120
-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編(1995)『上海史－巨大都市の形成と人々の営み－』東方書店
-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編（1997）『上海人物誌』東方書店
-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編(2000)『日本僑民在上海』上海辞書出版社
-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編(2002)『上海 職業さまざま』勉誠出版
-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編(2000)『上海－重層するネットワーク』汲古書院
-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編(2005)『戦時上海－ 1937 ～ 1945 年』研文出版
- 陳祖恩（2010年）『上海に生きた人々』大修館書店
- 陳祖恩（2006年）「上海日本人居留民戦後送還政策の実情」『北東アジア研究』第10号島根大学
- Adachi, Nobuko (2006) *Japanese diasporas: unsung pasts, conflicting presents and uncertain futures*: Routledge
-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efu Harumi and Sylvie Guichard-Anguis (2001) *Globalizing Japan: Ethnography of the Japanese presence in Asia, Europe, and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 Ben-Ari, Eyal; Clammer, J. R., eds. (2000), *Japan in Singapore: cultural occurrences and cultural flows*, Routledge
- Ben-Ari, Eyal; Yong, Yin Fong Vanessa (2000), "Twice Marginalized: Single Japanese Female Expatriates in Singapore", *Japan in Singapore*: pp. 82-111

- Clammer, John (2000), "The Happiness-Making Machine: Soka Gakkai and Japanese Cultural Presence in Singapore", *Japan in Singapore*: pp. 175-193
- Hamrin, Tina (2000), "Tenrikyo in Singapore: Rerepresenting the Japanese presence", *Japan in Singapore*: pp. 194-215
- Lee, Everett S (1966) *A Theory of Migr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Gordon Mathews and Bruce White (2004) *Japan's changing generations*: RoutledgeCurzon
- Ong, Aihw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assen, Saskia (2007) *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 W.W. Norton
- Sato, Machiko (2001) *Farewell to Nippon : Japanese lifestyle migrants in Australia*: Trans Pacific Press